

反对哲学史方法論上 的修正主义

(論文集)

关鋒著

人民出版社

2672/10

反对哲学史方法論上的修正主义

(論文集)

关 鋒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商標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6 $\frac{5}{8}$ · 字数 130,000

1953年8月第1版

195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 定价 (7) 0.60 元

統一書号 2001·100

校对者：郝淑珍等

目 录

序言.....	1—33
——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34—46	
一点说明.....	47—51
——答邓初民先生	
和贺麟先生辩“矛盾斗争的绝对性”.....	52—62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63—117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118—133
扬弃三法.....	134—154
——有关哲学发展和继承哲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155—198
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	199—208

序 言

——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

这里,我想根据我的理解,向讀者介紹一下近一年多以来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规模相当大的“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哲学史方法論問題。会前几个月,馮友兰先生、賀麟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就发表了一批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問題,也做出了明确或不明确的結論;或者沒有結論,但是提問題的“邏輯”却在导向一定的結論。这些文章,尤其是馮友兰、賀麟先生的文章,实际上成了“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谈会”的提案。这次会议,实际上討論的問題是:

一、关于唯心主义的評價問題:一方坚决为爭取予唯心主义以“更高”的評價而斗争;一方坚持唯心主义(哲学原則)是絕對錯誤的論断,并細致的分析唯心主义哲学原理的錯誤性,和它的不同形态以及它在不同时代所起的社会

[⊖] 这些文章,有馮友兰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問題”、“中国哲学遺產的繼承問題”,賀麟的“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爭論問題的意見”。另外,还有朱伯昆的“我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任繼愈的“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上列文章,均載“中国哲学史問題討論专輯”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作用。

二、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方在各种术语的掩盖下，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一方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的斗争的绝对性，反对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深入探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

三、关于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什么范围里进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偷梁换柱”式的；问题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亦即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有没有唯物史观的论断，是不是正确。在这个问题上，一方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前有唯物史观（所谓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否定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一方坚持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并努力说明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向历史唯心主义转化的事实和规律。

四、关于继承哲学遗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比較复杂的。但是，问题的提法却是形而上学的。馮友兰先生提出了他的“抽象继承法”，他的同道賀麟先生却是反对的。然而，他們这一方，在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即：从哲学史上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沒有的（或与之相同、近同的）“好东西”，現成地拿来使用；并趋向或径直否認哲学的阶级性，据說哲学中有超阶级的、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因此，这些先

生們相互之間的爭論，無論言辭如何激烈，那不過是“戰術”上的爭論，而在根本方向上、實質上是沒有任何分歧的。另一方，則堅持哲學的階級性，並企圖通過揭露歷史上哲學鬥爭和政治鬥爭聯系的複雜性，顯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真理；在批判形而上學的繼承觀的同時，也在深入研究如何正確解決繼承哲學遺產問題，並擴而大之，進一步研究和闡明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針問題。

上面所說的前一方，即以馮友蘭、賀麟先生為主要的代表人物。這一方所打出來的旗幟是：反對教條主義。但是，從以上所述可見：由“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揭開的鬥爭，不是什麼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固然也揭露了中國哲學史工作中的一些教條主義的現象；但是，被以反對教條主義面目出現的先生們所堅決反對的，卻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不過他們確是利用了一些教條主義的現象罷了[⊖]——而是兩條基本路綫的鬥爭，即：哲學史工作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路綫和唯心主義路綫的鬥爭。

但是，這條唯心主義路綫却有它獨特的特征，這就是：它不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公開對立，而是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以既辯證又唯物的姿態出現；它反對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却“玩弄無窮盡的遁辭，企圖避開問題的實質，掩飾他們的背離，用某一唯物主義者代替一般的唯物主義，堅決不願直接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

⊖ 這里不論這些先生們是否都是自覺地這樣做；主觀上是否自覺、是否完全自覺，對於探討兩條路綫鬥爭的實質是沒有意義的。

数的唯物主义的言論”^①。总而言之，其手法是修正主义的。如果說，它和历史上的哲学修正主义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提倡这条路綫的先生們，大部分从来就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从来就沒有真正信奉过辯証唯物主义；因此，也就談不到什么“由于背弃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于恐惧和不能够公开地、率直地、决定地、明白地‘清算’自己所抛弃的观点”^②，而采取扭扭怩怩的姿态了。这些先生們，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扭扭怩怩的，其原因在于客观——我們的国家是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馬克思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光輝的胜利，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和信任，这种客观形势使得唯心主义者不願意公开自己的面目；这种客观形势也不能不迫使唯心主义改变形态，改变向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斗争的形式。

因此，發生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基本路綫的斗争，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綫和唯心主义——修正主义^③路綫的斗争。

这场斗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不仅是因为那次“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規模相当大、参加的人数相当多（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范围，它討論和爭論的是哲学的一般問題、基本問題；而且因为它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的（后边我們还要較詳細的討論这个問題）。許多人，从一定的立場出發，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頁。

② 同上。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③ 我們这里所說的是哲学史方法論上的哲学修正主义，下同。

根据自己的观点参加了斗争。“座谈会”后发表了許多文章；搜集到“中国哲学史問題討論专輯”里的文章，就将近40万字。在此書出版以后，还繼續发表了一些文章。

在这场斗争中，馬克思主义者“当仁不让”地出来捍衛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理之当然。应该說，在这场斗争中锻炼了馬克思主义者。有些青年哲学史工作者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集中进行的哲学斗争。有些不久以前轉到理論战綫上来的老干部，他們经历了阶级斗争的大風暴，但参加这样集中进行的哲学斗争也还是第一次。在这场斗争中，他們受到了锻炼。从总的方面來說：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許多問題和謬論，也就不能不更深入地考虑問題、更細致地分析問題；因此，通过这场斗争，对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确是推进了一步。在这场斗争中，馬克思主义者被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先生們称作“教条主义”者，但是，实际上他們对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較細致的批判，却是同时在反对真正的教条主义的。

“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谈会”开罢不久，有些人問：“馬克思主义是否胜利了呢？”答复曰：“似乎胜利得太容易了一些。”——这話出于不同的人之口，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在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嫌对反对者的批判还不够尖銳（是的，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是两条基本路綫的斗争，还没有明确提出开展反对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斗争），对某些問題的分析还很不深入，特别是“立”的方面（指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如何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还做得很差；而在另外一

些人則覺得實在是勝負難分，這說明了他們還處在動搖狀態中；在提倡唯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先生們，無非是說：“什麼勝利！批判者們都是教條主義的典型。”

鬥爭，似乎是要在中國哲學史或哲學範圍里，繼續進行下去。

但是，接着到來的是右派分子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瘋狂進攻，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對右派的堅決反擊。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哲學工作者、哲學史工作者，也都無例外地自覺地參加了或是被卷進了這場鬥爭。這是一場政治鬥爭；然而，也是對他們的哲學觀點的考驗，近一點來說，則是在“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上所表明的哲學觀點的考驗。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問題是：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擺在提倡中國哲學史工作中的唯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先生們面前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堅持自己的哲學觀點，用以分析當前的政治問題，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還是放棄自己的哲學觀點？還是保持自己的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矛盾狀態，而在政治鬥爭中徬徨、動搖？

有必要說明，右派頭子是密切注意了中國哲學史工作戰綫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的。例如右派謀士費孝通，在他那篇煽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臭名遠揚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里，惡毒地污蔑了我們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宣傳、教育，說是“像小孩子看草台戲，劇情看不懂，就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了打就叫好”；接下去又說：知識分子前進了，他們要求把唯物唯心的問題搞清

楚，但是“別人还是紅脸白臉的对付他”，这样会把積極的东西变成消極的东西。他說的“別人还是紅脸白臉的对付他”，就是罵在“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上批判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馬克思主义者。他鼓励那般先生們：“向前走吧！用你們的哲学观点去分析当前的政治問題吧！……”費孝通的反动党性，使他看出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邏輯联系。

反右派斗争，似乎把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綫的斗争盖过去了，然而，客觀的邏輯是不留情的；它深刻的揭示了由1956年冬天醞釀、由“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揭开的两条基本哲学路綫斗争的實質，揭示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二)

当然，哲学观点并不就是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并不就是政治斗争。但是，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却是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邏輯联系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動綱領之一，就是反对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力謀资产階級唯心主义的复辟。他們的階級本能使他們意識到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間的联系，知道唯心主义复辟会在政治上引导到什么后果。所以，他們在疯狂地进行他們的政治陰謀的时候，也沒有忘記“哲学”。

如果說，在“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上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先生們，大多数沒有意識到这一点，还不自覺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現实的政治观点存在着一定矛

盾的話(这里是就多数而論,有的不在此列;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上大放厥詞的朱啓賢,就是一个右派分子),那么,在反右派斗争中,客观事实却在揭露着这种联系和矛盾。为了說明問題,我們举两个例子。

賀麟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上,是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急先鋒,是特別坚决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絕對斗争性这条基本原理的。当时許多同志友好的批評他这一点,指出他在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而他却嘲諷这些同志,說別人誤会了他的意思。他那时宁願玩弄无穷尽的遁辞,而不願公开承認否定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絕對性。然而,在右派的反动的政治暴風雨袭来时,賀麟先生的腔調变了。他有一篇“必須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在那里說:“这次关于哲学史的討論,很多人似乎公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絕對的’作为指导原則,违犯这个教条便被斥为‘脱离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然而……經典著作中找不到这一条原理”。他較之在“中国哲学史問題座談会”上,“理直气壯”得多了,他公开出来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絕對斗争性”了。根本敌对、相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具有絕對的斗争性,而且有共同、一样的內容(这就是提倡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先生們所說的“統一性”)——請以这条原理,推論一下当前的现实政治斗争,会得出什么結論来呢?賀麟先生这样做了,

⊖ 載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他說：“經典著作上并未說過唯物同唯心的鬥爭是絕對的，統一_是相對的。也沒有說過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絕對的。”^①當時右派分子正在不遺余力地混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界限，說兩者沒有本質的區別，抹煞它們的鬥爭的絕對性，宣揚階級調和。這無非是麻痺勞動群眾的階級意識，以售他們的好計。而賀麟先生也公開反對“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鬥爭的絕對性”這條原理了；顯然他從否認矛盾、鬥爭的絕對性，向“前”走了。這已經不僅是哲學觀點的謬誤，而且是政治觀點的謬誤，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替右派幫腔了（說得客氣一點）。要是從這裡再向“前”走，真是“不知其可也”。

說“經典著作上并未說過唯物同唯心的鬥爭是絕對的，統一_是相對的。也沒有說過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絕對的。”這是純粹的瞎話。但這裡却是顯示了一條客觀的邏輯：唯心主義同唯物主義的鬥爭不是絕對的——矛盾的鬥爭不是絕對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不是絕對的。這是一貫的邏輯。堅持否認矛盾鬥爭的絕對性，用以分析階級關係，如果不願意陷入自相矛盾，就必然得出否認階級鬥爭的絕對性的結論。客觀邏輯的力量，是不饒人的。

在右派分子徐懋庸身上，更完整地顯示了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哲學鬥爭和政治鬥爭的邏輯聯繫。他並不是搞什麼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但在“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

^① 據“新建設”1957年6月號“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散記”，未聞其詳。贅重點是引者加的。

之后也写了一篇“敌与友的关系”的杂文，“修正”恩格斯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接着他就运用他信奉的这种哲学分析当前的政治问题了：人性论——红色资产阶级（“过了时的纪念”）；真理对各阶级一视同仁——资产阶级也在掌握真理了——认识的阶级性、真理归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真理归于谁家”）；异中求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共同之处，都拥护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是戴上宗派主义的眼镜；那眼镜，使我们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对于异派来求同，自然更是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同与异”）一言以蔽之曰：“共产党是假洋鬼子，不准红色资产阶级革命！”（嗚呼！）

从徐懋庸身上显示出来的逻辑：一般的说来，唯心主义——哲学修正主义观点——荒谬的政治观点，反动的政治行动；特殊的、表现的最明显、最完整的，否定根本对立的東西之间的绝对斗争性，徐式“同异法”（“哲学”）——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都拥护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红色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不承认资产阶级是红色的，是假洋鬼子；打“假洋鬼子”，“革命”！

逻辑的力量，就像钟表上的发条。哲学观点的内在逻辑，它在指向一定的政治观点。除非是破坏这个发条，或是指针走到一定的地方发生了故障，那是定要走到它指向的政治观点的。

当然，这不是说，“逻辑”使右派分子成为右派分子的。

但是，右派分子如果有点兒哲学的話，他的哲学一定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观点一定是和他的哲学观点密切相联系的。一般而論，在我們国家里，用唯心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把唯心主义哲学合乎邏輯地应用于政治問題，那么他的政治观点也不能不是荒謬的、反动的。当然，有不少的人，其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是有矛盾的，在我国現在的情况下，在知識分子中这种情形是比較多的。有些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动摇、迷惑而终于清醒了过来。我想人們应该从这里觉察出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状态，所以曾一度动摇迷惑，主要是阶级立場問題，然而“哲学”在这里也起了作用；所以终于清醒了过来，乃是沒有或终于放弃了以他的哲学观点分析当前政治斗争、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針。在这里，从表面看来，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联系的邏輯是不明显的。“自己的家事自家知”，如果反省一下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变化状态，那么是会弄清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邏輯联系的。

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长期保存的。然而，终究是要这样或那样的解决的。我們要和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知識分子作朋友，但也劝督他們改造世界观。要做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不改造世界观是不行的。我們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帮助这些朋友們改造思想——当然，同时也对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残余作斗争，如果有的話。

事实比公式更复杂；这种情形也要說一說：有的同志在某件工作中或某次爭論中表現了唯心主义观点，但在反右派斗争中却是坚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这些人是为现象所迷惑，一时在实际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他们并不是唯心主义的自觉信奉者，他们的世界观，整个說来还不是唯心主义的。其所以陷入唯心主义的錯誤，認識論上的原因居多，当他不自觉的用唯心主义观点分析当前政治問題，得出結論时，他們会大吃一惊，无产阶级的立場使他們必然断然推翻这个結論，并从而怀疑、乃至放弃所抱的个别唯心主义观点。从这里不是看出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沒有联系，而是相反的，倒是看出了联系，在政治上的坚定，正是阶级立場、政治观点克服了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一时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作一个清醒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世界观必須是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三)

在这里簡略地探討一下，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發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的社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是必要的。

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發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战綫上的反映。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有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两面性。其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当然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在这方面表现的更持久、更顽固。他们接受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还想维持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并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改变周围的环境。当右派分子挑起激烈的阶级斗争，阴谋推翻社会主义时，他们的尾巴翘得更高了，有些人跟在右派的后面要来改变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个阶级的要求，不能不在各方面有它的代表。这种要求反映在哲学——哲学史工作上，就是以唯心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唯心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并在知识界以及广大群众中抬高唯心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也就自觉的作了右派复辟唯心主义的自觉行为的应声者。

为什么又表现为修正主义的形态呢？一般说来，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它在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因此，唯心主义者不愿意公开地反对它，公开地打出唯心主义的旗帜，而采取了修正主义的形态。以辩证法家姿态出现，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多么“名正言顺”啊！——如果我们所指的那些代表人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被资产阶级推着走而不得不然的“客观必然”了。

特殊地说来，则是唯心主义者“移花接木”的结果。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必须彻底清算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里，又显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这条真理。可是，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在解放以后并没有徹

底地清算自己的唯心主义，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它。他們也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却是“移花接木”式地“学习”，企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花”接于唯心主义之“木”。这样就只能是穿上一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把唯心主义巧装打扮起来。这样，結出来的果子，就不能不是修正主义形态的唯心主义了。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有一位先生针对自己的情况說：“搞了几十年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体系充塞了头脑，现在不学习馬列主义就是公开的‘率直’的唯心主义者，学馬列主义就要做修正主义者”。这话未免过分悲观；但是，却也道着了一点真实（当然是片面的）。“移花接木”式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要搞出哲学修正主义来的。悲观倒是不必的。社会变化了，人也在变化着；唯心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抛弃呢？改造的条件好得很，所欠的只是主观努力的“东风”了。搞了几十年的唯心主义，当还没有把它彻底清算的时候，这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头；但既經彻底清算，就会变成前进的有利条件。他深知敌情，具有較多和較深刻的理論思維的教訓；那么，就有希望在哲学方面，在新方向下做出一些真正的成績来。

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發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綫，也有其認識論的根源；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有迷惑人的力量。

客觀世界有其現象方面和本質方面，現象常常不是正面的直接的表現本質的；有其主流和支流，二者也是矛盾的；整体表现为各个方面，它們并不是直接的同时显現在人們的眼前的；發展之流是一个螺旋型的曲綫，而曲綫的每一